

马克思 恩格斯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书信

中共衡阳市委党校翻印

一九八〇年八月

马克思 恩格斯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书信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

[1846年] 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
人身的理性，谈这种永无谬误、永远等于自身，只要正确的
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的理性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
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提供了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
历史中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一定系列。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
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他们对自身的运动是误解的，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
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
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
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书信》的
译文，这次由中央编译局根据原著重新做了校订，
我校部分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新译本供内部学
习使用。

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相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相应的交往和消费的形式。在生产、交往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的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制度。这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概括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生产力——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受着人们所处的条件的限制，受着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的限制，受着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造而是由前代人创造的社会形式的限制。任何后代人都得到前代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作为自己进行新的生产的原料，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历史中的连贯性，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从而随着人们的社会关系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人发

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人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观念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应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交往”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章程制度，曾是唯一适应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态的社会关系。在公会制度和章程制度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果实本身。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革命和1688年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在英国都被打碎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的**。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绒、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么点东西也算是一个大功劳！蒲鲁东先生不了解，

人们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还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绒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同人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死的、不变的、无感情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存在；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思想的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一旦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以范畴的形式、思想的形式呈现在他面前，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永恒的存在。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把资产阶级思想看作永恒真理而加以运用，所以他就寻找这些思想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它们现有的平衡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把它们看作抽象的思想，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

都希望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正象封建形式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这个错误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推翻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个资产阶级思想的真正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凭借狡猾发现了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了两个孤立的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同实际生活、现代生产（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隔离开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令人作呕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间酝酿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些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创造的。小人物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是一切政治运动的死敌。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的解决不在于公众的行动，而在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实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不向自己提出是否必

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的问题。他和那种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当作永恒范畴的政治空论家一模一样。他只是在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它们之间的一方时而是胜利者时而又成为对方的奴隶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到第二天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作为这些封建事物的基础和这些封建事物的对抗的基础的一切社会关系。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的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们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您一开始就可以在他那里发现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出现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

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

……至于说到《中央报》，那个人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设想价值这个概念还有点意义的话，就一定要同意我的结论。[1]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2]，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也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证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出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消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同样人人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从社会总劳动中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然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中能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表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状态中，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

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

注 释

- [1] 指署名“赫”的书评《马克思，卡尔〈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三卷）。第一卷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版》，载于1868年7月4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28号第754—756页。

《中央报》即《德国中央文学报》是德国一家科学报道和学术评介性的周报，1850年至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

- [2] 马克思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章（《商品和货币》）。在德文第二版及以后各版中这一章相当于第一篇（见《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于伦敦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1]上看到了摩里茨·维尔特这只凶兆之鸟对保尔·巴爾特的书①的评论②，这个批评使我对该书本身也产生了不良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巴尔特确实象摩里茨这个家伙引证的那样说过，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方式是原始的动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生活方式起作用，然而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论述的那个问题。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摩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这样的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谈到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时所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

①保尔·巴卡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

②摩·维尔特《现在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
——编者注

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2]。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也是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有多少，而产品的多少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变化和进步的东西，而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也应当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做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开头将要采用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发展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者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种词句，他们把这种词句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与它们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大量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词句（一切都可能变成词句）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会有一个巴尔特出来，攻击在

他那一流人中间确实已被弄成空话的东西本身。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反社会党人法[3]给予我们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涂了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强大得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作家中间，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提供一切，而结果也不过如此。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不是最好的东西就是犯罪。

注 释

[1] 《德意志言论》是奥地利的一家经济和社会政治杂志，1881年至1904年在维也纳出版；1881年至1883年6月是周刊，1883年7月起改为月刊。

[2] 1890年6月14日至7月12日《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在总标题《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己》下面连续刊载了纽文胡斯、恩斯特和费舍的文章，以及一封署名“工人”的信和这次辩论的结束语。

《人民论坛》即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

周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同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青年派”接近；1887年至1892年出版。

- [3]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也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些斗争的**形式**，这些因素是：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结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国家制度等等），法的各种形式，甚至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及其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切因素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数的偶然现象（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证实，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不予注意）为自己开辟道路。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是最终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作祟的传统，也起着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

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和发展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恰恰是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1]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首先是这样一个因素：勃兰登堡由于领有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问题，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形成奥地利王权时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过去和现在的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这种音变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分界扩大成为贯穿德意志的真正裂痕），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就有一个由力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无穷的群，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局，这个合力本身又可以被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无意识地和无意识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的运动规律的。但是，尽管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肉体组织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状况（或是他自身的，或是一般社会的）促使他去争取的东西——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也决不应当从这里作出结

论说，这些意志就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此外，我请您根据原著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这个理论，这实际上要容易得多。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这个理论在起作用。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卓越的范例。《**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面对论敌时，曾经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这个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阶段，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可能有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完全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这里也制造了惊人的混乱。……

注 释

- [1] 指十六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种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反过来作用于生产的条件和进程。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